

20世纪河南移民与铜川社会变迁

石智勇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 20世纪河南移民或因寻找工作机会,或因逃难求生,大批迁居铜川。铜川从而成为河南人聚居的一个陕西城市。迁入铜川的河南移民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有着不同的职业身份。他们对铜川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风俗变迁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新铜川的形成过程中,与陕西本地人一道做出重大贡献。

[关键词] 20世纪;河南移民;铜川;社会变迁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1.1628

铜川是陕西省所辖的地级市,位于陕西中部、地处关中平原向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铜川毗邻咸阳、延安和渭南,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人数众多的河南移民。随着河南移民的涌入,使得铜川社会在经济和文化风俗方面产生巨大变化。作为陕西城市的铜川,越来越具有河南特征。关于移民群体对迁入地社会变迁的影响问题,学界内已有前辈做过研究。吴小玲^[1]、王义康^[2]、梁磊分别探讨过历代钦州湾移民、唐代河朔移民和清中叶以后东北移民与迁入地社会变迁的问题。葛剑雄、周振鹤和游汝杰也在各自学术成果中,讨论过该问题。然而,当前国内学界缺乏对20世纪豫籍移民与铜川社会变迁的整体性研究,仅有个别学者在其学术成果中涉及过小部分相关内容。例如:畅同欢曾在其文中提到民国铜川戏曲种类的增多与河南移民密切相关^[3]。本文在前辈学者工作的基础之上,试图对20世纪豫籍移民与铜川社会变迁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以期对该问题有明确认识。

一、上世纪铜川的河南籍移民概述

移民概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对迁入地社会的影响。下文从人口占比、职业构成和迁入原因三点入手,分析说明河南籍移民大概情况。

(一) 人口占比

20世纪铜川迎两次河南籍移民迁入高潮。第一次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据1944年编纂的《同官县志》记载,1942年的同官人口调查表记录生活在同官(现为铜川市辖区的一部分)的豫籍居民有2870人^[4]⁸⁴,人数上位居外省籍居民首位。相比之下,位列第二的山西籍居民只有1910人^[8]⁸⁴,在人数上远低于河南籍居民。同年,整个同官县的居民人数只有47015人^[8]⁸⁴⁻⁸⁵。此时,河南籍移民约占同官总人口的6.1%。另据《铜川市志》记载,1942年,同官县约有54889人^[5]⁹⁴,按此记录,则豫籍移民占全县总人口的5.23%。

第二次迁入高潮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据《铜川市志》记载,1958年至1960年,共有11648名无户口迁入人口,其中8994人原籍河南^[9]⁹⁷,占比约77%。在这三年中,迁入铜川的总人数是98693人^[9]⁹⁷。由此推断,这三年中,迁入铜川的河南籍移民总人数约为75994人。1958年至1960年,全市自然增加和迁入增加的总人数为138294人^[9]⁹⁷⁻⁹⁸,大致推断这三年内大约55%的铜川新增人口是河南移民。由此估计,这三年里,河南移民在全市总人口占比不低。时至今日,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籍移民及其后代占铜川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6]。

(二) 职业构成

迁入铜川的豫籍移民,其职业构成并不单一。矿工是河南移民的主要职业。也有河南移民选择从事其他职业的。例如:手工业小生产者、商贩、教员、技术专家。

1. 矿工

很多资料记载过河南籍移民在铜川当矿工谋生的情况。民国编纂的《同官县志》中明确记载生活在铜川的大部分河南籍

移民的职业是矿工。“属河南山东籍者,大都为矿工”^[8]⁸⁴。

《铜川市志》也提到“尤其河南省人大批迁入,进矿做工”^[9]⁹³。1942年,有八家河南回族人来到铜川定居,他们中间有在煤矿当矿工谋生的。“有的下煤矿”^[12]¹¹⁸。另外,兰彩英在研究中发现,当时同官煤矿一厂的下井矿工中,河南籍移民达到800多人^[7]³⁶。这些史实都说明矿工是当时迁铜河南籍移民所从事的职业之一。

2. 其他职业

经营手工业亦是当时铜川河南籍移民的职业构成之一。据《同官县志》的记载,民国时期迁铜的豫籍移民部分以经营手工业谋生。“或难民有家室而营手工负贩各业”^[8]⁸⁴。1942年到铜川定居的河南籍回族人之中,就有贩卖牛羊肉为生的,“有的卖牛羊肉”^[8]¹¹⁸。《同官县志》中亦记载有河南移民以商贩为职业的史实^[8]⁸⁴。1942年,有从河南迁居铜川的移民,在铜川担任煤矿教员的职务^[12]³⁹。上世纪,亦有部分河南籍移民作为技术人员来到铜川。张广石原籍河南开封,1939年,他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来到铜川,担任过同泰煤矿、同城煤矿的工程设计工作^[9]⁹⁹⁶。

(三) 迁入原因

寻找工作机会和逃难生存是河南籍移民迁入铜川的主要原因。

1. 寻找工作机会

自民国时期始,铜川地区矿藏丰富、矿区林立、是当时陕西省重要的生产区域之一。咸榆公路和陇海铁路咸铜支线的建成通车,促进铜川矿业的逐渐发展^[8]¹¹⁶。但当时矿区的生产设备极其简陋,绝大多数都是手工的笨体力劳动^[9]¹⁰²,这就需要大量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创造较多的工作机会。当时大批河南籍移民来到铜川,寻找工作机会。“尤其河南省人大批迁入,进矿做工”^[9]⁹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迁入铜川的河南移民人数众多,仅11648名迁入铜川的无户口人员之中,便有8994名河南籍人员。这些河南移民来到铜川的原因也是寻找工作机会。“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农民生活极为困难,纷纷来铜谋生”^[9]⁹⁷。

2. 逃难求生

20世纪40年代,河南发生大规模灾荒,无数灾民无奈背井离乡,向西来到陕西寻求生存。铜川成为他们新的家园^[8]¹⁸⁴。其中亦包含一些河南籍少数民族同胞。1942年,河南遭遇灾荒,先后有八家回民迁来铜川落户^[13]¹¹⁸。据铜川三里洞煤矿老工人李炳和回忆,他们一家和介绍他到同官煤窑当矿工的那家人都是逃难来陕西求生的河南移民^[10]⁷⁷。

二、河南移民与铜川社会经济变迁

今日的铜川是陕西重要的工业城市,工业是铜川经济最主要的支柱产业。然而,民国时期,铜川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却不是工业,而是农业。1942年的同官县全县人口只有54899人^[9]⁹⁴,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便有47239人^[8]⁹²。农业人口占全县

总人口的86%。时间之船航行至1949年，同官县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比重有所降低。这一年，同官县农业人口有72698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至76.5%^{[9]101}。1970年，农业已经不再是铜川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全市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数的29.5%^{[9]101}。与农业日渐丧失主导地位相反，工业在发展中渐渐取代原先农业的地位，成为铜川社会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民国时期，铜川工业发展缓慢，以1946年的调查为例，该年同官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有12758人，从事工业、矿业的人只有1343人^{[9]103}。此时工业尚未成为铜川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至1965年，铜川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48.4%^{[9]102}，成为占就业总人数比例最大的产业。1997年，铜川工业所占比重达到85%，农业仅占15%^{[9]176}。在上世纪中后期，工业已在铜川社会经济结构中，居主导地位。至此，铜川社会经济已完全发生变化。上世纪铜川社会经济实现从农业主导型转变成工业主导型的巨大变迁，除了国家对工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外，河南移民的大量迁入也对这一巨变起到关键作用。河南移民在铜川外地移民中占多数，外地移民落户铜川之后，大都选择当工人谋生。“共有无户口人员11648人（新工人8630名，家属3018名）”^{[9]97}。再加上河南移民中还有工业技术人员，促进铜川工业的发展壮大，推动社会经济的变迁。

三、河南移民与铜川社会的文化风俗变迁

河南移民大量迁入铜川，使得地处关中文化区的铜川，在社会文化风俗方面产生变化，河南戏剧文化、方言、饮食成为铜川社会文化风俗的一部分。

（一）戏剧文化的变迁

秦腔是关中文化区戏剧文化的典型代表。河南移民大量迁入铜川之前，秦腔在铜川地区可谓是一枝独秀。“戏剧，纯系秦腔”^{[8]454}。1942年，铜川本地居民出钱创办秦腔剧社，名为同声剧社^{[8]454}。随着河南移民的大批落户，来自河南的戏曲开始在铜川流传开来^{[8]454}。新中国建立后，迁入铜川的河南移民人数不断增多，来自河南的戏剧文化在铜川日益流传开来，日渐繁荣。1952年，铜川成立县豫剧团。1958年，铜川成立市豫剧团^{[9]828}。铜川不仅成立豫剧团，还在戏剧学校中开设豫剧班^{[9]830}。由此可见，豫剧在铜川十分流行，甚至达到与秦腔平分秋色的地位。河南剧种能在位于关中文化区的铜川流行，与当地河南移民密不可分。《铜川市志》的相关记载证实河南移民在铜川豫剧发展中起到的关键作用。“铜川市区河南籍市民分布较多，为豫剧的流行提供了条件，故豫剧成为当地观众最喜爱的剧种之一”^{[9]834}。河南移民大量迁入铜川，铜川的戏剧文化随之发生变化，来自河南的豫剧与秦腔等陕西传统戏曲一同成为当地戏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铜川戏剧文化不再是陕西戏曲一统天下的局面。

（二）方言的变迁

铜川地处陕西关中文化区，原先的铜川方言并无河南话这类中原官话的影子。民国时期，铜川方言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同官地虽褊小，而方言较复杂：东区近蒲富，舌音多入浅喉；南区混耀而北属宜君”^{[8]410}。蒲城、富平、耀县以及宜君皆属陕西方言区，由此可知，陕西方言在民国时期的铜川社会语言格局中处于一家独大的地位。

随着河南移民的大量落户，河南方言也随着进入铜川社会之中，河南话遂成为铜川社会的通用方言之一。铜川社会出现“方言、普通话、河南话杂用”^{[9]919}的语言格局。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亦证明河南话在今日铜川的流行。“城区及近郊的人说话用词有不少普通话、河南话词语”^{[11]3}。在河南移民的影响下，铜川方言发生较大变迁，铜川成为陕西方言区内的一

个河南方言岛。

（三）饮食的变迁

铜川未迁入大量河南移民前，当地人的日常饮食几乎都是陕西传统食物。饸饹^{[8]392}、黄酸菜、玉米糝子、搅团^{[9]907}等陕西特色饭食占据着铜川人的餐桌。大批河南籍移民来到铜川生活，来自河南的饮食习俗也渐渐成为铜川社会饮食文化的一部分。烩面^{[12]101}、胡辣汤^[13]等河南饭食渐渐地登上包括铜川人在内的关中居民的餐桌。在河南移民的影响下，铜川人的饮食习俗发生大的变迁，河南饭食融合进铜川社会的饮食文化当中，与陕西传统饮食一道使铜川饮食文化从单一转变为多元。

四、结论

从20世纪迁来铜川的河南移民，在铜川社会变迁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河南移民的到来，为铜川工业发展提供大量所需劳动力和部分技术人员，推动铜川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增加全市非农人口数量。进而推动铜川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到2018年，铜川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列，甚至超过了全国的城镇化平均水平^{[14]90}。河南移民为铜川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做出重大贡献。河南移民为铜川这个陕西小城带来不一样的河南文化，在丰富当地社会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推动铜川社会文化的向前发展。铜川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与20世纪河南移民的迁入密切相关，一个崭新的铜川社会诞生，既离不开陕西本地居民的贡献，也离不开河南移民的汗水。

参考文献：

- [1] 吴小玲. 古代移民与钦州湾地区的社会变迁[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2(5).
- [2] 王义康. 唐代河朔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变迁[J]. 民族研究. 2007(5).
- [3] 畅同欢. 清代及民国《同官县志》所载演剧活动考述[J]. 文化学刊. 2019(3).
- [4] [民国]同官县政府. 同官县志(民国)整校本[M]. 铜川: 铜川市印台区史志办公室, 2006.
- [5] 铜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铜川市志[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6] 刘新中. 难却乡音[J]. 西部大开发. 2019(6).
- [7] 兰彩英. 抗战时期同官煤矿矿工生活研究(1939—1945)[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 2017.
-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铜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铜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M]. 铜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铜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4.
-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铜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铜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M]. 铜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铜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3.
- [10] 铜川矿务局政治部编写组. 家史·矿工恨[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9.
- [11] 丁德科, 茹钢. 渭北(铜川地区)方言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2] 张颖.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对陕西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J]. 西安社会科学. 2008(4).
- [13] 曹明明, 邱海军. 陕西地理[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作者简介: 石智勇(1997·12-)男, 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历史地理学。